

云贵高原的『坝子社会』：

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边疆

本书是我们这项有关「坝子社会」长期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科大卫教授主持下，由香港科技大学和中山大学共同参与的「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大型研究计划中的子课题的一个团队计划，名为「中国西南的坝子社会研究」。在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和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组成了「云贵高原的坝子社会」研究团队，自二〇一三年以来，在廖迪生、赵敏组织牵头下，团队成员分工协作，就鹤庆、凤羽、大理、洱海、凤仪等坝子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特别就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宗教联系和市场网络、马帮交通运输的网络、地方庙宇和神灵体系的变化等问题展开田野调查和文献搜集、整理工作。在持续的讨论总结和不断提炼问题的基础上，大家以地方文化观念中有关「坝子作为一种社会共同体」的理解作为出发点，努力揭示「坝子」空间建构的文化诠释。我们就一些「坝子社会」有关「文明的来历」的文化诠释进行了深入讨论，也就交通体系在串联坝子、交通路线在坝子中汇集产生的文化影响进行了长期的考察。例如，历时数年的有关马帮口述历史、明清时期赵州（今凤仪）碑文的搜集、整理和有关赵州的「道路交通与宗教接引」的宗教诠释的发展，就是往这一方向努力的成果。我们亦力图揭示坝子之间在文化上的综合性整合的路径。例如有关洱海的研究、有关坝子中的本土或土主神灵体系与庙宇、风水空间和灌溉农业之间的关系，乃至洱海作为大理及周围各个坝子之间在文化上的「开关」隐喻的理解，也都是我们从「坝子」与「社会文化的共同性整体」的角度展开研究时的观察与发现。而且山区作为坝子的联结，我们注意到神山圣地在大型的网格之间的历史关联及相关的宗教诠释的塑造，有关这些体系的不同诠释方向及相互竞争等等。总体而言，经过长期的协同研究，我们认为，坝子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基于整合的灌溉农业体系发展起来的社会空间概念的，不过当我们围绕著「坝子」展开讨论时，我们的着眼点还是基于明清以来「坝子社会」的历史构建对当代的社会文化影响。就云贵高原或云南西部而言，这代表了地方群体在国家体制所预留的社会和文化空间上呈现的选择、应对的策略与社会能动性的发展方向。

赵敏 廖迪生 ◎ 主编



云南大学
YUNNAN UNIVERSITY

云贵高原的『坝子社会』：
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边疆

赵敏 廖迪生◎ 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边疆

云贵高原的『坝子社会』：

赵敏
廖迪生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贵高原的“坝子社会”：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边疆 / 赵敏, 廖迪生主编. —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482-2417-4

I. ①云… II. ①赵… ②廖… III. ①民族人类学—研究—云南省 IV. ①K28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2618号

策划编辑：赵红梅

责任编辑：蒋丽杰

封面设计：王姘一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研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3.25

字 数：238千

版 次：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2417-4

定 价：45.00元

社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电 话：(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本研究获得以下学术机构及
研究计划的资助

谨此致谢：

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
(第五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

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

云南省南诏大理历史文化遗产与发展研究基地

云南宗教治理与民族团结进步智库

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

地理生态、国家政治与山区、坝子分异下的 社会整合与离散

(代前言)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马健雄 执笔

一、“坝子”与“坝子社会”

云贵高原群山连绵，云南更是山高谷深、地域广阔，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 000米以上，西北部高山峡谷纵横，东部较为平缓，西北最高峰梅里雪山主峰海拔6 740米，南部河口县红河河谷海拔仅76.4米。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差大、地貌起伏的边疆省份，山地与高原约占全省土地面积的94%。根据地理学者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研究，云南各种类型的山间盆地、小型河谷冲积平原等地貌较平缓的地带，仅占全省土地面积的6.52%。这些散布于山脉河谷间的平地，云南人俗称为“坝子”，其中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的坝子共1 442个，面积总和为244 465.39平方公里，约占云南省土地总面积的6%。^①其中，面积在50~100平方公里之间的较为大型的坝子共42个。^②这些坝子中面积较大的，例如昆明、大理、曲靖、昭通、鲁甸、蒙自、楚雄、丽江、中甸、普洱、景洪、保山、腾冲等著名的“大坝子”，都是云南各州（市）、县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工农业生产基地，坝子中市镇密集，是人口高度集中的区域和交通干线连接的枢纽。从总体上交通位置的重要性、人口集中度和城镇分布及发展的趋势而言，我们可以说，云南乃至西南边疆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变迁，是离不开相互联通、以坝子作为社会经济骨架的城镇、农村和交通综合体系的。

云南有句民谚：“山里头的望着坝里头的，坝里头的望着村里头的，村里

①童绍玉，陈永森. 云南坝子研究[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2.

②童绍玉，陈永森. 云南坝子研究[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22.

头的望着城里头的。”这里的“望”指“巴望”，有因羡慕而景从、由期盼而仰仗的含义。也就是说，云南的山区和坝子之间、村落和城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经济条件上的差异，在当地人看来，山区与坝区的差异不仅是地理环境上的，也是社会经济条件上的。我们这本书集中讨论的“坝子社会”，就是基于这样的地貌和社会特征，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关系入手对云贵高原的“坝子”做初步的研究比较，希望能够借此深入探讨“坝子”的地理形态与地方文化和社会特征之间的时空联系。特别是对于当地不同人群而言，历史上的社会文化变迁，与当地的自然地貌、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又是如何被当地人认知的？这是我们的研究期望能够回答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希望以云贵高原，特别是云南西部山区地貌为出发点，来探讨在这样的环境下，当地社会在历史变迁过程中是否存在某些共性与差别，是否存在一些基本的影响要素。因此，本书从不同坝子的案例研究出发，以地方社会文化和历史进程为中心，以云贵高原山区的地貌特点为条件，集中讨论云南或贵州的一些“坝子”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某些体现在社群关系、文化价值及历史建构上的地方特点、差别和共同性。也就是说，这不是一部以环境史、人文地理学为讨论目的的著作，虽然免不了要以地理环境为问题讨论的出发点。我们的目的，是探讨地理地貌的限制性条件与当地社会、文化体系的建立和历史变化，以及相互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性。

这样，界定什么是“坝子”，就不只是民谚里提到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从高度密集的人口分布来界定“坝子”或“平坝”与山区的社会差异。就地貌而言，云贵高原的山间盆地，包括一些河谷冲积扇、台地等坡度起伏比较平缓的河谷、台地，地理学家认定它们都属于“坝子”。“坝子是指内部相对低平、周边相对较高，内部地面坡度在80~120度以下的山间中心型盆地，小型河谷冲积平原，河谷阶地，河漫滩和冲积洪扇，起伏较缓和的高原面、剥蚀面及高原面上的低丘，较大的山谷等地貌类型。”^①然而，当地人观念中的“坝子”，要比地理学家的定义显得更加宽泛和灵活，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这样理解：在云南、贵州及东南亚山区高地，由于山高谷深、群山连绵，那些相对比较平缓的地方，因为它平坦，就成为人们眼中的平坝，即“坝子”，那种不属于陡峭山坡，也不是高山的平缓地方，就可算是“坝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坝子”更多的是地方概念中与“山”相区别的、相对于陡峭的山谷和坡地而言不一样的自然地貌类别。但是，这样来理解什么是“坝子”显然是不够

^①童绍玉，陈永森. 云南坝子研究[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21.

的,因为除了地貌的意义之外,“坝子”还是经过长期整合的一个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

“坝子”早已是西南地区和东南亚一带地方民众广为使用的地貌概念。例如重庆的沙坪坝、贵州的车江大坝^①,都是云南以外的其他西南山区广为使用的地貌概念。根据李拂一的研究,以“坝子”一词指代“平原”或者“盆地”,并非源于古汉语。古汉语中的“坝”,主要指“堤坝”;“坝子”的“坝”,则是因为其发音为BA(ba³⁵),原先是来源于壮傣语系中的词汇。^②“BA”的用法不只在中国西南,在缅甸和泰国北部也很常见。例如,傣语词中的“勐朗坝”“橄榄坝”,或者云南南部滇缅边境居民常常将到缅甸曼德勒一带做生意叫作“下坝子”。不过,回溯“坝子”这一地方概念的历史变化,我们发现,在明代后期的文献记录中,“坝子”尚未成为被文人接纳并广泛使用的地貌概念。明末成书的《徐霞客游记》中,徐弘祖在描述今天的巍山坝子时说:“蒙化疆宇较蹙,其中止一川,水俱西南下澜沧者,以定西岭南脊之界其东也。”^③清代以前,许多以坝子为中心的府、州、县行政体系,多以“川”或“甸”的概念来指称,例如剑川、宾川、鹤川。显然明代云南西部的“川”,不仅仅是一个指示地貌的概念,也是当地政府行政体系及其管辖地域的官方名称的总称。因此,就“山间平地”概念的历史变化而言,“川”不仅仅是“坝子”这一地方脉络中的地貌概念。

换句话说,今天云南及大部分西南山区和中南半岛北部山区民众习惯以“坝子”的概念来描述多山地区的山间平地的地貌,历史上曾经有另一些惯用概念,如前述的“川”或“甸”。泰国北部的清迈平原,云南方言和当地人都称为景迈坝子,历史文献中称其为“八百大甸”。不过,由于“川”“甸”常常成为官方的行政机构所辖地域的名称,所以我们判断,“坝子”是较为晚近的、在当地人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概念。更早见诸史料的与坝子有关又不同于坝子的历史性概念,我们还可以追溯到与描述后来文献中的“川”“甸”概念相关的南诏大理国时代的“𑖇”或“𑖇𑖅”。“𑖇”在今天的白语中发音为“da²²”,类似“甸”音,指成片的农地。例如明清时期的赵州坝子,在南诏之前及南诏时期,就曾称为“石和诏”“渠敛赵”及“赵川𑖇”,从大理国时代至元代,又称“赵𑖇(𑖇)”“赵州甸”。元代文献描述这里的地貌环境时

①参见张兆和所写文章《苗王、萨玛、诸葛亮：从信仰崇拜看中国贵州榕江县车江大坝的开发历史与族群互动》。

②李拂一。复庐存稿[M]。台湾：里仁书局，2005：125。

③徐弘祖。徐霞客游记[M]。朱惠荣。校注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1160。

说，“山行四十里至赵州甸，即赵脸也。山形四周回抱，有藏风蔽气之势。川泽平旷，故家乔木犹有存者。神庄江贯于其中，溉田千顷，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灾。”^①邓川坝子也曾称为“邓赅”，是南诏之前“邓赅诏”的所在，邓赅后来以“川”取代“赅”，改称“邓川”，其后再以“坝子”的概念加诸邓川，成为今天地方民众所称的邓川坝子。^②

简言之，即便今天的“坝子”是一个与地貌有关的地方概念，它所指的“山间平地”的地貌特征及其与之对应社会政治空间，都曾经历了长久的历史变迁，与当地的政治体制、农业、交通、生态环境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着。也就是说，至少就云南西部而言，大体上汉语中的“坝子”是一个逐渐从“以山间平地为中心的社会政治体系”中更清晰地分离、发展出来的壮傣语借词，而壮傣语中，地貌上以“坝”描述山间平地的概念则早已有之。在今天看来，规模化灌溉农业的发展是“坝子”最重要的经济条件，使得它具备比山坡和河谷更高的人口承载能力；就社会政治层面而言，坝子往往成为当地的政治中心，城镇、周期性的集市贸易更多地集中在坝子中。从整体上的地理联系来看，坝子成为云贵高原与东南亚的交通体系的枢纽和支点，与坝子中高效的灌溉农业的发展直接相关。

综合上述我们对“坝子”的地理、经济、社会政治、地方文化特性的初步理解，我们决定以“坝子社会”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是因为我们认为，如果能够从当地人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的角度来理解“坝子”的含义，以“坝子”地理空间以及它所连接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为研究的切入点，多山环境下中国西南边疆及东南亚山区社会的某些特性，就成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地理和社会历史上的普遍意义的问题，这一出发点也有助于我们从当地视角和地方文化的理解入手，来研究坝子体系的社会意义及其历史进程，进而分析讨论为什么当地人能够建立并维系属于“自己”的社会文化空间。此外，“坝子”作为一种类型化的社会文化综合体，隐藏在其社会历史进程之中的某种地方性的“社会能动性”也就呼之欲出。所以，我们试图从农业经济、宗教、交通以及与“文明”和“开发”有关的地方文化的诠释，来理解历史上西南边疆地方民众眼中的“中心”与“边缘”意义及其与明清以来的国家政治中心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希望看到，西南边疆不仅仅是明清时期被“居庙堂之高”的官僚士大夫们看作是“天高皇帝远”的蛮荒或放逐之地，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民而言，这里

①郭松年. 大理行记[M]. 校注本. 王叔武, 校注.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6: 14.

②樊绰. 蛮书: 卷五[M]//方国瑜.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上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443.

更是一些与“坝子”有关的社会群体具体而日常地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发展自己的文化策略的社会空间。在这方面,20世纪90年代杨庭硕等学者推出“西南书系”时就提出,当代学者应该努力将生态、经济、族群关系与历史过程等问题加以综合地研究讨论,从而跳出“从中原看边疆”的边疆史和民族史束缚。^①我们非常认可这样的研究路径,并期望从细致深入的地方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分析入手,来理解地方与国家的关系及文化建构的关系。

本书是我们这项有关“坝子社会”长期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科大卫教授主持下、由香港科技大学和中山大学共同参与的“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大型研究计划中子课题的一个团队计划,名为“中国西南的坝子社会研究”。在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和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组成了“云贵高原的坝子社会”研究团队,自2010年以来,在廖迪生、赵敏组织牵头下,团队成员分工协作,就鹤庆、凤羽、大理、洱海、凤仪等坝子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特别就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宗教联系和市场网络、马帮交通运输的网络、地方庙宇和神灵体系的变化等问题展开田野调查和文献搜集、整理工作。在持续的讨论总结和不断提炼问题的基础上,大家以地方文化观念中有关“坝子作为一种社会共同体”的理解作为出发点,努力揭示“坝子”空间建构的文化诠释。我们就一些“坝子社会”有关“文明的来历”的文化诠释进行了深入讨论,也就交通体系在串联坝子、交通路线在坝子中汇集产生的文化影响进行了长期的考察。例如,历时数年的有关马帮口述历史、明清时期赵州(今凤仪)碑文的搜集、整理和有关赵州的“道路交通与宗教接引”的宗教诠释的发展,就是往这一方向努力的成果。我们亦力图揭示坝子之间在文化上的综合性整合的路径。例如有关洱海的研究,有关坝子中的本主或土主神灵体系与庙宇、风水空间和灌溉农业之间的关系,乃至洱海作为大理及周围各个坝子之间在文化上的“开关”隐喻的理解,也都是我们从“坝子”与“社会文化的共同性整体”的角度展开研究时的观察与发现。而且山区作为坝子的联结,我们注意到神山圣地在大型的网络之间的历史关联及相关的宗教诠释的塑造、有关这些体系的不同诠释方向及相互竞争等等。总体而言,经过长期的协同研究,我们认为,“坝子”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基于整合的灌溉农业体系发展起来的社会空间概念,不过当我们围绕着“坝子”展开讨论时,我们的着眼点还是基于明清以来“坝子社会”的历史构建对当代的社会文化影响。就云贵高原或云南西部而

^①杨庭硕,罗康隆.西南与中原[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言，这代表了地方群体在国家体制所预留的社会和文化空间上呈现的选择、应对的策略与社会能动性的发展方向。

二、坝子社会与道路交通体系、贸易网络和国家

我们的研究关注的问题，与学术界长期以来讨论的一些重点话题密切相关。经过长期研究我们注意到，在坝子和坝子之间，通过国家力量和地方民众共同对交通体系的维护，不同的利益群体同时也在长期经营着一个大规模的商业贸易网络。明清以来，中国与东南亚的联系，例如外藩和土司的朝贡、官员往来、银铜矿产的解运、民间的商品贸易乃至战争期间的后勤补给，都将东南亚北部山区、滇西北藏族聚集区与长江流域联系起来。在云贵高原和掸邦高原，交通往来也就是从一个坝子翻山越岭到达另一个坝子的旅行。我们发现，一些大的坝子中市场、农业灌溉和地方神灵的体系之间在长期互动中相互整合的同时，在坝子之外或者坝子之间，同时还维持着更高一个层级的跨区域的网络，其中包括大范围的政治经济往来和宗教联系。寸云激和李学龙的研究表明，像鹤庆这样较大的坝子，天子庙及与之相连的本主巡游体系，同时还与来自藏族聚集区的藏民到鸡足山的朝拜重叠，也与当地的马帮贸易配合。因此，鹤庆坝子中的市场，并不仅仅是鹤庆坝子内部市场贸易的地点，同时也是广泛影响着周边大规模的牲畜市场和远距离贸易的结点之一，鹤庆商帮和他们的马帮的活动力和影响力远及西藏和缅甸。在其他的坝子情况也类似，虽然他们在规模上各有不同，影响的范围和路线各有侧重。这样，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西南边疆山区道路崎岖、交通艰难不便的地理条件之下，对明清时期的中央政府而言，维持西南地区交通体系的顺畅运作，成为先于其他要务的国家政治问题，就这样的地理条件和边疆条件而言，“坝子社会”的运作模式，不同于从地方农业体系平行地发展出一套从下到上的，从基层到中层、高层的基于国家行政和城镇体系的假定。这样，我们有必要检讨，强调地理空间与地方社会运作及其与国家关系的“施坚雅模式”，并不能够解释在“坝子社会”这样的地理空间限定下的社会文化框架的一些基本特点。

施坚雅认为，西南是整个中国市场体系的一部分，而且地方的市场层级分布，正好构成了地方行政体系的基础层。^①但是我们从坝子内部的市场和坝子之间的体系来看，西南山区的情况其实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区域性的市场与城镇有受制于坝子体制之间交通的可能。另一方面，特有的山区资源，例如矿

^①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4, 24 (1): 3-43.

产、药材、牲畜，与特别的交通需要，例如外藩的朝贡、云南与缅甸和藏族聚集区之间的远距离贸易等等，这些与坝子社会紧密相连的地理特点和社会条件，都严重地规限了基于农业社会的基层市场的发展和层级递升；反而，历史上地方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更多地还是受制于整个坝子体系所能够参与和支撑的交通网络的类型及其与东南亚、长江流域和藏族聚集区的沟通渠道的有效性和不被其他政治因素干扰的畅顺程度。也就是说，坝子之间的体系，限制和规定了坝子内部的区域性农业市场，同时坝子内部的市场也需要依附于坝子之间的大规模、远距离的流通体系。这样，物资在流通的同时也与地方社群的关系和宗教体系相配合，呈现为向东南亚、藏族聚集区及长江流域开放的，以坝子为社会政治和商品流动枢纽和支撑点的网络体系。因此，以坝子为中心的地方族群关系和社群文化也受制于同样的网络格局，其相互间的关系也是在这样的格局中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坝子社会”是与施坚雅所假定的封闭的、作为长江流域市场体系的一个分支的西南不一样的一种基于坝子和坝子之间的扩散型网络联系的市场和文化社会体系。而且，这是一个多层次的网络社会体系，难以将其归类为简单的中国国内市场的西南之末梢。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们也可以从云南马帮的扩展性和基于一些大坝子的政治及商业网络，例如前述的鹤庆商帮或者赵州的马帮中，看到具体的实例与运作方法。

与施坚雅模式不同，在明清时期中华帝国的西南边疆，基于保障朝贡安全和远距离贸易乃至军事控制等的需要，在国家政治和远距离贸易经济的推动下，在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农业生产所建立的社会空间之外，外在的、基于国家的地缘政治需求而得以长久维护的扩散性交通网络，深入地影响着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无论从农业、经济和宗教等方面，都不断地重塑了地方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由国家政治力量强力维护的道路交通体系和保障贸易安全的政治需要，这些外在的影响，长久以来加诸于坝子和山区社群的日常往来之上，构成了另一个更加富有控制性的社会网络层。故此，地方社群所营造的社会文化空间，也因此与这一远距离联通的交通贸易网络相连接，并协调配合。无论是远距离马帮运输还是长时间的朝圣与贸易，无不与此相关。我们从赵州坝子的例子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大范围、向坝子外扩展的交通网络与地方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建构密不可分，同时也构成了明清时期的府、州、县行政体系乃至土司体制在这样的坝子社会网络之间建立起来的基本框架。西南通向缅甸和印度的道路交通和贸易的历史，从文献中我们至少可以追溯至汉代^①，

①方国瑜.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16.

那么，这样的交通地理到底如何影响和塑造了道路边的坝子社会？或者说，就山区道路交通所依赖的坝子社会的整体而言，地方民众是如何创造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价值的？我们看到，例如赵州坝子，清初以后村落庙宇的活动在地方生活中愈加活跃，与之相关的公共财产的建立与管理运作也相互配合，以村落庙宇为核心，村落作为分担国家赋役的共同体来应对赋税和与交通相关的夫马的能力也随之越来越强。显然，这是因为国家对道路交通控制的政策有所改变，民众的赋役压力更加沉重。

在不考虑西南山区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建构的复杂历史关系的前提下，前人的研究已经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重要问题。近年来，美国学者纪若诚提出，了解云南西南部边疆与内地的关系，可以用某种“中间地带”的特性来描述。他指出，云南西部的腾冲至南部的西双版纳一带边疆山区，在清代的中前期，不同的人群作为社会活动者，纷纷利用当地条件，将这一地区塑造为文化上流动着、经济上互换的地方，各种类别的边界和文化实践交互流动。^①并且，远距离贸易带来的商品流动也推动着地方社会的转变。因此，边疆的流动性为现代的云南与东南亚之间的网络联系奠定了前现代的历史基础。^②另一位学者希尔也指出，在缅泰北部山区，“云南人”总是被视为跨地域活动的生意人但总被缅甸和泰国的原住民当作陌生的“外来者”；云南人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可是云南人又被泰国政府视为某类当代的“山地部族”，因此原住民则一直把他们称为“霍人(haw)”。^③我们如果从“坝子社会”的网络特性来看，在东南亚北部世代与云南人接触的当地群体而言，坝子社会面向宽广山区的开放空间和基于坝子结点的发散型社会网络，正是云南边疆与东南亚北部山区之间强大的社会能动性之所以存在并长期不断重塑地方社会的重要原因。基于这些观察，我们也试图从“坝子社会”的特性入手，来解释中国西南边疆突出的社会文化与物资的流动性和社会整合与社会离散反复交替的过程之社会基础，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由坝子作为结点和支点所形塑的多层次网络的联系能力、扩散性以及地域之间的社会文化关系。

①C. Patterson Giersch, *Asian Border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 [M]. Cambridg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7.

②C. Patterson Giersch. *Cotton, Copper and Caravans: Trad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west China* [J] //Eric Tagliacozzo and Wen-Chin Chang eds. *Chinese Circulation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7-61.

③Ann Maxwell Hill. *Merchants and Migrants: Yunnanes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98: 9.

何汉德认为,明朝将西南少数民族拒之于“文化”之外,当地精英既不能够参加科举,更不能够进入王朝体制之中,不过他所讨论的黔西北水西一带,与云南的情况不大相同。^①自南诏大理国以来,云南西部就是中国西南部与东南亚北部连接地带的传统政治中心,直到元、明、清时期,交通线所串联的坝子还一直维持着西南边疆交通沿线的基本框架,以此为基础,构成了元明以来以云南府、大理府、临安府、永昌府为核心的云南社会政治体系的地理骨架。在这些地方,地方精英一直强势参与了元、明、清时期以来的国家政治,他们不但积极参与科举,也发展了独特的地方学术体系,既说不上与“内部殖民”有何牵涉,也难以简单界定为当地社会的变化是国家对边疆“开化”的直接结果,毋宁说,在强大的国家力量进入之时,地方精英在妥协与退让中谋求新的机会极富经验。我们看到,地方精英以其富含能动性的协商能力参与了明清时期的国家政治,他们以坝子社会的宗教及学术网络为发挥空间与国家体制周旋。^②如果没有认真具体的研究分析,我们不应简单地将“西南边疆”视为无条件的统一整体,同时又将它看作长江流域的一个分支和角落。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如前述纪若诚提出的,为何在这样的边疆会长期存在着显著的“流动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难以下结论说,在西南纷繁复杂的山区和坝子社会,其中从不存在历史性的整合和重构的机会与过程。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地检视基于坝子的地方社会的历史过程和文化流变,以及其背后国家政治和地理地貌的影响。这样,我们努力尝试寻找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以便能够在历史脉络中检讨地方文化和社群关系的整合、离散和流动的原因与方式,以此来解释我们长期面对的地方社会文化现象。

在对坝子社会的讨论中,我们并非仅以某个坝子作为问题的核心。一方面,从宏观的国家政治的角度来看,“坝子社会”是历史过程中由围绕着坝子的不同社群或村落共同体组成的联合体,在特定的地理和社会政治环境下,民众围绕坝子作为社会空间建构或重构自己的地方整体,共同应对外来挑战,诸如国家的赋役压力或与另外一个坝子或社群之间相互间的竞争或寻求合作。同

①John E. Herman. *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 [M].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2007; 另见李林.“开化”与“殖民”两套诠释话语的论争与困境——兼与John E. Herman教授商榷[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13, 6(80): 151-170.

②Jianxiong Ma. *The Zhaozhou Bazi Society in Yunnan: Historical Process in the Bazi Basin Environmental System during the Ming Period (1368-1643)* [J] // Ts' ui-jung Liu edit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ast Asia: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31-155.

时，地方精英成为民众的代表，民众也会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之下将凝聚的主体性和能动力付诸实践，寻找与各种外在政治经济条件相协商的策略，从而不断重建和更新生活中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共同体，“坝子社会”在其自我塑造的历程中也经历着不断的冲突、竞争。一些新的社会整合的方向与可能性，或者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对抗，也持续地冲击着地方群体的整合与维系，社群共同体随时面临着离散和重构的危机。也就是说，坝子及坝子之间的道路网络、坝子与其所辐射的山区社群之间的联系，也同时成为坝子中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并没有将“坝子社会”等同于“高地社会”与“低地社会”的加减法，因为“坝子社会”凸显的，主要是基于不同层次的网络体系的离散与整合的社会动态和文化特征。“坝子社会”的这一特点，要求我们就学术界长期就东南亚山区“高地”与“低地”的讨论进行比较。

我们知道，云贵高原与东南亚山区相连，国家的界线却将这些山脉、河流和坝子分开了。在这些山区中间坝子错杂，不过由于海拔高度及纬度的差别，从滇西北“三江并流”高山峡谷区到缅甸掸邦高原，不同地带森林与动植物分布的类型、降雨量、积温、霜期，特别是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不同方向的季风带影响下的雨季、旱季等差异极大的自然地理条件，不但严重地限定了不同地区的山区农业和地方物产的类型，也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社会和文化样式及族群关系。因此，山区社会与坝子的关系，一方面要视当地在整个交通体系中的位置和山区资源的分布情况，另一方面也需要考察具体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山区资源与临近坝区的互补性。例如，山区出产的茶叶、药材、牲畜、矿产、盐、玉石、翡翠、木材等等，这些重要资源有的涉及国家财政体系的稳定，甚或为宫廷需求，如历代中央王朝和地方政府对山区盐井不懈经营，对大量开采银铜矿的渴求、茶叶和药材的输出等等。这些重要资源莫不分布于山区、莫不依赖于马帮的运输，也都跟官府、商人的经营分不开，更与政府的税收与官员的前途命运攸关。所以，当詹姆斯·斯科特将中国西南部和东南亚北部的山区民众单一化约为：因为在这些山区，居民依赖于“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他们总是持续迁移，国家政治也就无法对如此富有流动性的人民实施统治，山区族群发展出来的文化也就是拒绝国家政治统治的进入和侵占的文化，并因此能够实行基于平等主义的、拒绝权威的基层社群组织方式。斯科特借用了“若米亚人民”这一术语来描述东南亚高地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民众，并视其为整体的同一性的“山区”。换句话说，斯科特认为，国家政治是无法在山区（高地）扩

展的,可是国家却能够在坝子(低地)里面持续稳定地存在着。^①很明显,斯科特试图借用“游耕农业”的劳动生产特性来解释山区的社会流动性和离散性是一种抵制国家的效应。但是,研究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于山区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不但山区农业的发展条件差异极大,山区资源的分布形式也千差万别。尽管如此,山区社群无不通过由坝子所辐射的交通体系,融入更大范围的盐、茶、矿等依赖马帮运输的贸易网络中,同样也与联系着神山圣地的宗教网络合为一体。人类学家利奇早就对这一带山区与坝子之间存在的族群身份的摆动模式做了深入细致的经典研究^②,但是,假如我们再从“坝子社会”建构和辐射的多层次网络体系来看族群身份在政治体系之间的摆动,也可能仅仅是一系列牵扯着族群的或社会的整合与离散的、相纠缠的许多连环中的一节。很多问题,都需要我们从“坝子社会”及其与山区的联系入手,投入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才可能拼接出更加宏大的画面。

三、篇章结构与方法论

本书各篇章节的描述、分析和讨论,按照不同的重点,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将前述几项有关“坝子社会”的特征和相关的社会历史过程及文化诠释的发展,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编排。整体上,本书将“坝子”“坝子社会”及其与国家、地方共同体的整合、交通贸易和宗教网络、地方空间的文化诠释和宇宙观的建立,都排列呈现为逻辑上互为关照的章节当中。

我们认为,坝子首先是一个地方民众共享的社会活动空间。明清以来,坝子中的社会整合,很大程度上是在地方学者、士绅和政府官员的配合下,共同营造出一个以神话或风水理论来诠释空间想象的地理整体;其次,基于坝子中的灌溉农业的生产周期,坝子社会的整合主要依赖庙宇体系的运作来呈现;坝子中的庙宇网络体系,又主要按照水利灌溉体系的原则在代表村落的庙宇和代表中心性的城镇的庙宇之间进行排序,村民们逐步建立并长期在调整中维持的庙宇体系,使整个“坝子社会”呈现为一种“宇宙图式”的空间秩序及与之对应的村落共同体。马健雄研究的赵州坝子显示,从南诏大理国王权体制,到明清王朝的赵州社会的转变,主要就是从风水空间与朝贡道路相联系的交通枢纽的营建,来实现这种空间和宇宙观的转变的。最后,民众对坝子空间的文化诠释的方式,成为地方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文化策略,并主要以“坝子的开辟”作

①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west Asia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Edmund R. Leach. Political System in Highland Burma [M].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6.

为文明来源的诠释路径。具体而言，不同文本的有关坝子的“开辟神话”，有效地将本地人的日常生活与开辟者作为“文明的来源”的代理者联系起来，用以解释坝子体系中的村落庙宇和神灵所展示的空间秩序和社会关系。赵敏和寸云激对凤羽和鹤庆两个坝子的研究，清晰地解释了农业灌溉体系、村落庙宇和神灵体系与整个坝子的空间秩序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对应关系，亦论述了宗教仪式在坝子社会中的整合性作用。此外，有关坝子的开辟神话又诠释了这种地方宇宙观的建立与意义。

我们发现，以坝子为结点的社会联系向山区的辐射和扩展，不仅可以通过交通体系的延伸来实现，也需要通过长期维持、长久运作的市场贸易往来达成。而且，这样极富扩展性的体系，总是落脚在坝子中的城镇在这一空间体系中宗教、政治或经济上的中心地位。同时，村落与村落之间往往通过一个较为大规模的庙宇和仪式联系，以本主或土主节、庙会、神灵巡游或不同层级的朝圣活动，将整个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体系整合到以庙宇为空间联结点、以周期性的仪式“会期”来不断地确认和整合这一体系。同时，风水布局所营造的地方空间与开辟神话，也在不断地重建和完善人民与佛、菩萨或圣僧的联系，将这个“坝子社会”的“文明”与古代的王权或宗教力量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通过观察坝子中的村落庙宇及其仪式系统，我们清晰地看到南诏大理国的历史和这一地区明清以来的变化，是如何被村民整合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空间想象、社会秩序和文化与身份的诠释之中，并以“村落、城镇、坝子、山区”作为一个整体，建立起村民们日常实践中的宇宙观来的。这样，社群生活的“地方”或者“地点”，可以借助神话的诠释与历史上的王权、国家和宗教权威相配合，用以解释整体上的坝子社会与坝子空间的秩序与原则。这一地方民众的诠释逻辑，在赵敏研究的凤羽坝子案例中得到非常清晰的呈现。凤羽坝子曾经控制洱海北部通往茈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山区的交通要道，曾是控制云龙山区盐井、银矿和铜矿的重要通道，但凤羽只是一个小型的坝子，其作为交通枢纽的重要性远没有赵州坝子那么重要；就面积、人口和社群规模而言，凤羽坝子又没有鹤庆那么显著，尽管如此，就这三个坝子共同的“空间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而言，地方民众依然遵循着相似的文化诠释的逻辑。

因此，当我们讨论到坝子与周围山区的关系，研究坝子之间的网络如何覆盖到山区，山区社群又如何与坝子建立相互之间依赖关系时，我们看到，除了国家通过对山区资源的控制来深化国家力量与山区社群之间就盐井和课税、银铜矿、地方物产的贸易等等政治经济上的往来之外，把山区与坝子连为一个整体的，还有马帮组织和宗教网络等不同力量对山区的深入影响。马帮是山区和

坝区都必须依赖的、以畜力达成运输的临时性社会组织。虽然高山草场畜牧业和坝区农业之间的配合是我们目前尚在进行中的一个研究议题，但是透过马帮的活动我们也看到，大牲畜、山区土特产的流通和基于坝子中的城镇和村落的远距离马帮贩运组织，将不同地方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扩展到更为遥远的一端，交通和贸易将山区与坝区编织到一个大范围的网络之中。马存兆通过长期的马帮口述史研究，为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材料。马健雄、马存兆合作的章节，集中讨论了为何不同坝子的民众能够组织起临时性的马帮，而且马帮具备跨越自然地理和社会文化障碍的能力，能够将远距离贸易扩展为跨区域的社会网络。马帮的运作机制说明，通常情况下，马帮需要依赖于组建马帮的村落、城镇所属的坝子社会的扩展势力。只有在总体上具备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实力的群体，才有能力长久地维持向外延伸的社会网络关系，这些网络联系诸如季节性的劳动力流动、远距离通婚网络、秘密社会组织、贸易信用等等。之外，有能力组织起远距离贩运马帮的群体，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有关道路和旅途的地方性知识和经验，以应对各种道路上的障碍。这种情况下，远距离贸易所穿透的坝子与山区的网络才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

此外，地方网络的扩展也是宗教性的。李学龙对藏族群众到鸡足山朝圣的研究，就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山区又是如何成为坝子之间的某种联结点的。在崇山峻岭之中，总有一些山被视为不同层次的“圣地神山”，如云南西部的老君山、龙华山、石宝山、巍宝山、鸡足山等都是坐落于坝子之间的重要神山。历史以来，藏族群众依据自己的历法周期，从滇西北或更远的康、藏各地方到鸡足山朝拜，呼朋引伴、经年累月地行进在朝圣道路上，他们的旅途也就把这些神山串联了起来。同时，一些藏族的马帮也跟随着沿途交易，藏族地区的药材、皮革、马匹和刀具、金属制品等成为双方交易的主要物品，藏传佛教也在藏族群众的朝圣中持续扩展其影响力。鸡足山是历史上不同派别的佛教力量重叠、汇集之地，也是来自不同坝子的地方实力派竞争的舞台。例如，明代的土司丽江木氏、姚安高氏、蒙化左氏，以及一些地方文人如李元阳乃至徐霞客，都参与了围绕着鸡足山的文化建设和宗教交流，也推动着彼此之间的政治经济竞争。张兆和以贵州东南的车江大坝与云南做对比，论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坝子与山区的关系。张兆和指出，坝子与山区联系的另一类途径，即山区社群透过地方神灵的信仰建构来“复制”或“改写”基于坝子和山区的分异而产生的族群关系，地方民众以此为基础，灵活地应对国家体制的节节深入。在车江大坝的例子中，居住在山区和坝子中因“苗”和“侗”身份分异的不同族群，在清前期面对国家和移民双重的渗透和影响时，不同的社群分别以不同的策略，